

胡月

晚年

胡月

漓江出版社





2 034 1809 7

胡风晚年作品选



漓江出版社

胡风晚年作品选

胡 风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柳州市印刷厂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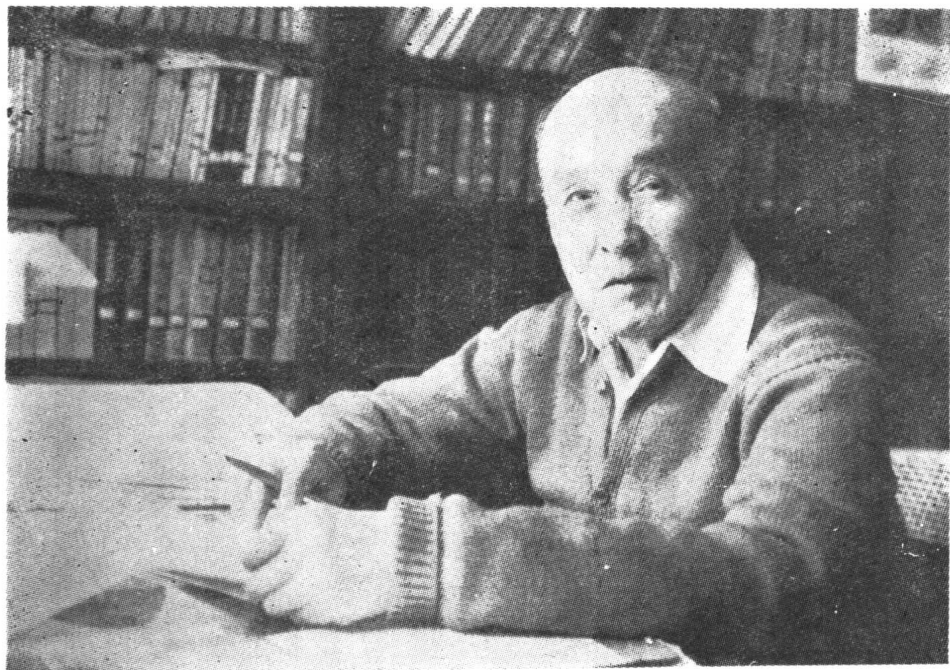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5 插页4 字数250,000

1987年1月第1版 198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6,600册

ISBN 7—5407—0006—8/I·4

统一书号: 10256·226 定价: 1.90元



一九八二年四月在北京寓所

我为什么写作 胡风

为了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而写。

为了表现 ~~起~~ 人民大众的生活困苦、
希望和斗争而写。

为了反映社会历史的发展动向和革
命的胜利而写。

也为了探求文学发展的规律 ~~河~~ 明
白其中的精神力量而写。

为了有益于人民解放、民族解放和
人类解放而写。

——1955年3月病中

前 言

胡风同志的晚年作品选出版了。我们为此感到欣慰。

这些文章都是他在病中或病稍见愈时很吃力地和疾病、衰弱作斗争，好不容易才写出来的。他伏案写作后精神不支，以至扑倒在书桌上的情景，至今还浮现在我的眼前，令人心伤！

1979年初，胡风同志刚恢复自由，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他渴望已久的自由写作。从此一直到1985年逝世时止，他共创作及修改旧作四十余万字（其中一部分是写呈给党中央的）。

这时，我们的心情是很矛盾的。许多朋友，尤其是现代文学研究者们都希望他能多写点文章，为后人留下宝贵的资料，但我们又担心他过于劳累，身体支持不住，所以有时不得不劝阻他停下笔来休息，因此还受到他的责备。

从1983年冬到1984年夏，是他一生文学创作中的最后一个旺盛时期。那篇《评论集后记》简直是一气呵成的。仅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写了近五万字，平均每天写一、两千字。并且顺利流畅，完全恢复了他过去的文风，一字一句都十分严谨，他人无法更改。同时，他还在继续写抗战时期的回忆，并修改一些旧诗文。令我们痛心的是，这段时间太短了，潜伏在他体内的癌细胞已开始扩散。但他并没有停止工作，一直坚持开完了全国政协会议后才住进医院。这时确诊为贲门癌，并已到了晚期，无法挽救。在住院初期，他仍每日亲笔写简单的日记，惦念着未完成的文章（我们没有告诉他病情），还为青年文艺工作者口述回信……。他的一生就是这样地执着于文艺、忠实于文艺。他的最后的创作，也就是这近二十万字，可以说是蘸着他未流尽的血液完成的。

1985/6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我现在就这本书的编排作个简短的说明。

第一部分是有关鲁迅的回忆,自己的一些观点、看法和对鲁迅作品的理解。这些文章中处处渗透着他对鲁迅的崇敬。

第二部分是各种纪念、悼念文章,为朋友们的书所作的序、跋和其他一些文章。他在这些文章中向一些已逝的朋友们表达了深切的悼念,向还健在的朋友们表示了对他们劳动的尊重,并对此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第三部分是他这几年来发表的一些短诗和关于诗的随想。

最后一部分则是对过去工作的介绍,学习心得和对自己文艺工作、文艺理论的总结及重新认识。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评论集后记》。在这篇文章里,他介绍和分析了自己九本评论集的出版经过及当时的具体情况,并对一些当时曾引起争议的问题作了力所能及的阐述,而这些问题,在当时他没有可能来为自己辩解。事隔几十年了,他的观点并未因多年的批判而有所动摇,所不同的是,现在已站在新的高度上来看待过去了。《我为什么写作》这篇短文,是应法国巴黎图书沙龙组织和瑞士《二十四小时报》之约而回答的。短短一百来字,言简意赅,充分表达了他对作家使命的认识。

可惜,由于有病,他不能多看书报,所以虽能感受到新人辈出的文艺界的繁荣景象,但却无法捕捉到新的信息,更多地学习、探索,来完善和发展自己的文艺理论,从而为他热爱的文艺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他生前,我和朋友们曾多次劝他,出一本近作集吧。但他却说,文章太琐碎了,等我写出几篇象样的文章时再出书吧。但是,这愿望未及实现,他就离我们而去了!现在只能将这么一本薄薄的书呈献给读者,算是他最后给读者捧出的一份薄礼吧!

梅 志

1986年5月

目 录

向朋友们、读者们致意

——代序……………(1)

关于“左联”及与鲁迅关系的若干回忆……………(3)

鲁迅书信注释

——涉及我和与我有关的情况……………(10)

关于鲁迅“转变”论的一点意见……………(26)

就有关鲁迅作品答客问……………(32)

学习鲁迅精神

——当作对于青年同志们的建议……………(35)

关于鲁迅的杂文(一)……………(39)

关于鲁迅的杂文(二)……………(52)

关于鲁迅的杂文(三)……………(68)

关于鲁迅丧事情况

——我所经历的……………(72)

一点回忆……………(81)

若干更正和说明……………(84)

《写在〈坟〉的后面》引起的感想……………(90)

左联离职前后在上海……………(99)

关于《七月》和《希望》的答问……………(121)

《七月》作者与海燕书店……………(125)

悼萧红……………(129)

我的悼念.....	(134)
为《晋驼短篇选》说几句.....	(136)
悼念江丰同志.....	(138)
难忘的哀思	
——纪念彭柏山逝世十六周年.....	(142)
“进入”到中国大学的上空来了.....	(147)
斗争的青春	
——《战斗的青春》序.....	(149)
革旧迎新五愿.....	(151)
介绍两位台湾作家——杨逵和吕赫若.....	(153)
我与萧军.....	(156)
纪念老舍同志诞辰八十五周年.....	(159)
纪念赖和先生.....	(161)
我读路翎的剧本	
——《路翎剧作选》代序.....	(164)
悼念天蓝同志	
——作为他的诗集的代序.....	(171)
《徐放诗选》序.....	(174)
《工作与学习丛刊》始末.....	(177)
深切的怀念.....	(181)
怀念周总理.....	(187)
怀念鲁迅先生.....	(188)
吊华陀.....	(189)
喜投神圣的一票.....	(190)
开国三记.....	(191)
读诗随感.....	(195)
附：小草在歌唱.....	(197)
激流里的石头.....	(208)

我的小传.....	(214)
我做的一些中日文化交流工作.....	(220)
“形象的思维”观点的提出和发展.....	(226)
略谈我与外国文学.....	(231)
《胡风评论集》后记.....	(252)
我为什么写作.....	(298)

向朋友们、读者们致意

(代序)

二十多年来，我与世隔绝，恍如过世之人。如今拿起笔来，要与千千万万的读者见面，心情是复杂的，那感触就更多了！

我想到了党。二十五年前，我曾写过这样的话：“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一些牺牲的先烈们和一直忠贞战斗着的同志们引导过我，教导过我……”，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在这近四分之一的世纪里，支撑我活下去的，就是对党的信念。我相信，党有这胸怀，也有这魄力。审慎而又全面地检视一切历史事件，对任何人即使是象我这样一个渺小的普通劳动者，也定将给以公正的，符合历史的评价。

我想到了鲁迅先生。三十年代，我曾经幸运地工作在先生身旁，亲聆过先生的教诲，感受过先生的坚深博大的胸怀。记得在四十年代，为纪念先生，我曾写过篇文章，《鲁迅还在活着》。今天，在我们的祖国医治创伤，进行新的长征时，我又想到，假如他还活着……。先生是逝去了，永远逝去了，但后死者的我们，在今天的中国，不是还有学习先生的精神，振作中华民族灵魂这样的任务吗？所以，先生虽然逝去了，但他还活在我们中间。

我想到了中国的新文学。与文坛已生疏数十年的我，来谈对现在文学的见解，也可能是话不中的。我总觉得，中国现在的文学

是性质极其丰富的，但这种丰富性如不好好对待，也有转化为各种不良倾向的可能。文艺上“单打一”的局面是我们最大的绊脚石，今天中央提出的文艺方针展开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只要屏弃“棍子”“帽子”“辫子”，真正地解放思想，发展下去一定会一天好似一天。

我想到了中国的青年。今天的青年，二十五年前有的还未出世。我要对他们说：你们年纪虽轻，却已在历史的风浪中久经颠簸，学会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们彼此是陌生的，但可以逐渐了解起来。我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在年轻时，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有过迷误，也有过徬徨，但终于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追随着光明。我的力量虽小，但也曾尽过这点微力，发现和扶持新人，讴歌过茁壮成长的幼苗。但在后来的岁月中，由于我的原因，不少的幼苗，中途夭折。今天，想到那些曾经见过及从未见过，但都因我而受株连的朋友们，自惭之情占据了整个灵魂。但我深知，这种谢罪是他们所不需要的，这些劫后余生者与死者需要于我的，是鼓起余勇，继续前进！

上面这些话，仅以告慰关心我的朋友们。我虽又老又病，但我仍愿与大家共同努力，为繁荣社会主义新文艺，贡献出自己的余生！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五日

关于“左联”及与鲁迅关系的若干回忆

我今年七十八岁了。我小时候家里很穷，父亲是磨豆腐的，母亲是童养媳。我后来用胡风这个笔名，就因为我母亲姓胡。

一九二九年秋我到日本，对外身份是拿官费的庆应大学学生，实际上从事左翼文化运动。一九三一年我加入了日本共产党和左联东京支部。左联东京支部的活动并不多，我记得我当时只参加过一次会议，出席者有任钧、谢冰莹等人。我当时通过左联成员韩起与冯雪峰通信联系，但没见过面。一九三二年底我曾回国一次，才认识了雪峰，记得那时左联书记是丁玲。

一九三三年我因从事左翼文化运动被日本政府逮捕，住了三个月牢，七月初被驱逐回国。回到上海后，左联党团书记周扬找我谈话，要我参加左联领导工作，担任宣传部长，我同意了。那时茅盾还是左联书记，但二、三个月后，他就辞去了书记职务。周扬又找我谈话，让我接替茅盾担任左联书记。茅盾一九二八年去日本，写了《从牯岭到东京》，被创造社、太阳社批得很厉害。他一九三〇年回国后，由于雪峰的关系加入了左联。丁玲被捕后，他接任左联书记。一九三三年《子夜》出版后，他在左翼文坛的地位已经确立，因此辞去了左联书记职务。其实他在担任书记职务期间，没做什么具体工作，只召开过几次会议。

我担任左联领导职务后，曾向文委（左联党团的上级领导）

负责人阳翰笙提出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但他并不热心，所以我后来也就算了。

我当左联书记后，周扬自己兼任宣传部长，任钧担任组织部长。一九三四年七月任钧被捕，周文接任组织部长，周扬也不再兼任宣传部长，由任白戈接任。我当左联书记将近一年，一九三四年秋末冬初，由于穆木天被捕后告密，我不能再当左联书记了。有一次，我在沙汀家里见到周扬，就向他提出辞职，他同意了。左联书记后来由田汉接任。我辞职后，周文也离开了。

我担任左联书记期间，左联工作是由周扬、任钧和我三人商量决定的。开会地点就在我家里，他们两人经常来我家。任钧被捕后，左联工作由周文、任白戈和我三人商量决定，开会地点改在周文家里。周扬就不来参加会议了。

鲁迅当时不参加我们的会议，但我经常与他见面，向他汇报左联的工作。当然，也不是每次见面都谈左联的事。当时并没有讨论过谁是左联与鲁迅的联系人，我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联系人的名义，但实际上我确实是起了联系人的作用。

我当左联书记后，鲁迅每月捐款二十元，作为左联活动经费，主要是供左联印刷机关刊物之用。茅盾则每月捐款十元，他的捐款是通过鲁迅转交给我的。茅盾辞去书记职务后，我不大和他见面，但他来过不少信，后来都未能保存下来。当时左联的活动经费就是鲁迅和茅盾每月所捐的三十元钱，开展工作确实是比较困难的。

我当左联书记后，组织了三个研究会开展活动。一是小说研究会，由欧阳山、聂绀弩负责，沙汀也是负责人之一，但他是挂名的，具体工作做得不多；二是理论研究会，由任白戈负责，他调任宣传部长后由谁负责就记不起来了；三是诗歌研究会，由穆木天负责，该会以中国诗歌会名义出版《新诗歌》，影响较大。

在此期间，我还主持出版了左联内部刊物《文学生活》。《文学生活》是油印的，由我编辑，何谷天（周文）、汪仑帮助

刻钢版，大约一个月出一期，薄薄的一本，内容主要是关于左联内部活动的消息。我担任左联书记期间，《文学生活》是坚持出版的。我离开后，好象还继续出版，并改成了铅印本，但我没有见过。

徐懋庸回忆说他一九三四年当了左联宣传部长，我不知道有这件事。徐懋庸还说当了宣传部长后，周扬要他找我谈话，希望我合作，被我拒绝。在我记忆中，也并没有这回事。至于他说当了宣传部长后就代表左联与鲁迅联系，恐怕也不见得。我辞去左联书记后，左联与鲁迅就没有什么接触了。当时鲁迅住的地方在租界以外，联系也确实不方便。而且鲁迅一九三四年给徐懋庸的信中可以看出，这些信都是一般的通信，谈的都是写稿、翻译、编辑刊物之类的事，鲁迅当时并没有把徐懋庸当作是左联和他的联系人看待。徐懋庸大约在一九三五年才担任左联领导职务。

鲁迅生前写给我很多信，现在仅存六封，大部分信都因为当时处境危险，不得不销毁了。为安全起见，这保存下来的六封信也都裁去了称呼。

我当左联书记期间，曾写信向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汇报工作。当时萧三在苏联，代表左联出席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会议，左联给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信是通过他转交的。我离开后，周扬他们批评我写的信“不正确”，可他们自己却迟迟不给萧三去信，以至萧三写信向鲁迅催问。鲁迅在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七日给我的信中提到了这件事，讽刺说：“可见‘正确’的信，至今没有发。”后来萧三关于解散左联的来信，是由鲁迅交我，由我交给王尧山转周扬的。

鲁迅对周扬他们是有意见的。他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八日给我信中提到的“元帅”就是指周扬。周扬当时不设法跟鲁迅见面，却让叶紫出面约鲁迅谈“公事”，即讨论左联的工作，所以鲁迅说：“我们的元帅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出外奔跑，……”。我辞去左联书记职务后，鲁迅也不再继续捐钱了。他一九三

五年八月二十四日给我信中所说的：“我们的元帅‘怪吝’说，却有些可笑了，……”就是指这件事。鲁迅接着又说：“其实，这是容易办的，不过我想应该大家出一点，也就是大家都负点责任。”后来，萧军要我问鲁迅，他要不要加入左联，鲁迅在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给我的信中就明确表示：“现在不必进去。”又说“我觉得还是在外围的人们里，出几个新作家，有一些新鲜的成绩，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

一九三六年周扬他们酝酿成立文艺家协会，自己不出面，却让何家槐写信邀鲁迅入会。何家槐因抄袭徐转蓬作品而被人称为“文抄公”，名声不好，鲁迅怎么会接受他的邀请呢？当然，韩侍桁曾利用何家槐窃文件事件攻击左联，鲁迅也是坚决反对的。

鲁迅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八日给我信中提到的“韩侍桁会打破人的饭碗”，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当时孙科办中山文化教育馆，陈彬和担任出版部主任。陈的秘书是杨幸之，杨本人比较左倾，他的朋友韩起又与我很熟悉，就通过这样的关系，杨介绍我进中山文化教育馆当编译。因为我当时一方面从事左翼文艺运动，一方面还要找个职业维持生活。我当时在该馆编的《时事类编》上用张果笔名发表了不少文章。陈彬和当时还加入了民权保障同盟，但这人其实是个骗子，他发表的一些文章都是杨幸之代写的。由于陈参加民权保障同盟，不久孙科就撤了他的职。接任的是国民党的钟天心，钟带着韩侍桁和左恭（我后来才知道左是地下党员）来接管。那天在办公室里，韩当着钟和左的面，对我说：你老兄真行，又拿国民党的钱，又拿共产党的钱。这一说就完全暴露了我的身份，等于在向国民党告密。于是我不得不马上辞去了中山文化教育馆的职务。

鲁迅这封信中提到了讨论文学遗产的事。当时我在《文学》上写了一篇文章，其中对陈辛人关于文学遗产的意见谈了自己的

看法，陈辛人和其他两人就又在《杂文》上发表文章与我辩论。同时，当时在左联东京支部的魏猛克给鲁迅写信，要鲁迅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因为魏猛克在上海时与鲁迅接触较多，由他出面较好。他们希望鲁迅的意见与我不同，这样就把我驳倒了。鲁迅的回答在这封信中写得很明白：“我答以可就近看日本文的译作，比请教‘前辈’好得多。其实在《文学》上，这问题还是附带的，现在丢开了当前的紧要的敌人，却专一要讨论枪的亮不亮（此说如果发表，一定又有人来辩文学遗产和枪之不同的），我觉得实在可以说是打岔。”我后来又写了一篇短文回答陈辛人，曾收在《文艺笔谈》一书中。

鲁迅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四日信中提到的“客人”，是日本人宫木喜久雄，我原先并不认识他。我在日本庆应大学时有一个同学泉充，我们两人当时都加入了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所艺术学研究会。我回国后在上海和梅志结婚，寄了一张结婚照给泉充留念。一九三五年泉充介绍宫木到上海来找我，宫木就拿了这一张结婚照和他在日本《普罗文学》上发表的文章证明他的身份。宫木要我帮他接上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要在苏联的日共党员佐野硕的夫人为他向共产国际证明他是日本共产党员，因为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承认，他在日共党内就有地位了。我把这件事托了鲁迅，鲁迅答应帮助他接关系，并每月接济他生活费三十元。宫木在上海等了半年，最后没接上关系，回日本去了。

鲁迅与《文学》的关系有两次大的分裂，一次是美国黑人作家休士来沪时，《文学》发表“伍实”的文章引起的，另一次就是《译文》停刊事件。鲁迅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给我信中提到的“替状元捧场”，“状元”就是指《文学》的傅东华他们。当时傅东华他们以“老大”自居，所以鲁迅在信中说：“我们大约一定要做第二，第三……”，鲁迅的意思是不管第一、第二，主要看谁对敌斗争坚决、有力。

在这封信中鲁迅还提到了“现任的皇宫”，这话是有来历的。